



拉萨及西藏 中部旅行记

ՀԱՄԱՅՆԱՐԳ ՇԻՆՆԻԺԱ

[印] 萨拉特·钱德拉·达斯◎著 [美] W.W. 罗克希尔◎编
陈观胜 李培荣◎译

中国藏学出版社



中国藏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印]达斯著;陈观胜、李培荣译.—2版.—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西藏文明之旅书系)
ISBN 7-80057-544-6

I. 拉... II. ①达...②陈...③李... III. 西藏—
地方史—近代 IV. 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9845号

书 名 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

作 者 [印]萨拉特·钱德拉·达斯

译 者 陈观胜 李培荣

责任编辑 永红

出版发行 中国藏学出版社
(北京北四环东路131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版 北京世纪品峰图文制作中心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第二版 2006年第一次印刷

开 本 640×965毫米 1/16

印 张 15.125

字 数 185千字

书 号 ISBN 7-80057-544-6/Z·394

定 价 27.00元

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E-mail:dfhw@zzcb.com.cn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得到《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一书英文本是在六七年前,当即请陈观胜、李培荣二位先生译成中文,延宕至今终得以正式出版。由于达斯西藏之行及由此引起的风波在西藏近代史中是不可回避的一笔,故写此前言以兹介绍。

国外对我国藏族和西藏地方的研究和关注始于 17 世纪,这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来的。17 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疯狂争夺殖民地,随着帝国主义对我国侵略的加强,西藏也成为了列强觊觎的对象。曾先后有葡、意、英、俄、法等国传教士入藏,进行文化侵略活动。虽由于西藏僧俗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清政府的干预,这种尝试归于失败,但传教士的窥视使西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开始为西方所了解。1840 年,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侵略势力蜂拥而入。早已垂涎西藏的各国侵略者加紧了入侵的步伐,英、法、俄等国多次派人潜入西藏。这些以各种身份进入藏境的西方人士大多以旅游考察之名行窃取情报之实,他们大量攫取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情报,绘制西藏各地方的地图,这些都为以后英国入侵西藏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现在看到的这本《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的作者是萨拉特·钱德拉·达斯。达斯于 1849 年出生于东孟加拉一个印度教家庭。在加尔各答管理学院学习时,他认识了孟加拉公共教育局局长艾尔弗雷德爵士,该局长指导他学习并把他推荐给印度政府。也因此,1874 年,还在学院学习的达斯就被任命为大吉岭菩提亚住宿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专门负责选拔当地土著学生到台拉登接受秘密间谍训练,然后派入西藏。达斯本人也曾到台拉登受训。台拉登是英国情报机构设在西姆拉的秘密训练地,主要“训练被选中的土著使用测量仪器及技术。因为他们入藏的行动是极其秘密的,所以,他们的行李都有秘密夹层,衣服有暗袋,手执的喇嘛转经筒里装满了记录纸,念珠则充当计数器,计算步行数以推测距离。经过严格训练后,这些土著间谍化装为喇嘛或商人,潜入西藏,进行各种情报的收集”。

“这些间谍绝大部分是与西藏有共同语言、共同宗教信仰的喜马拉雅山诸山国的土著，他们入藏后不易被识破，因此，他们收集的情报更加广泛和深入。”^①本书中陪同达斯进藏的乌金嘉措就是这些间谍中的一个。乌金嘉措是锡金藏人，白马央孜寺喇嘛，1873年作为锡金王的随从来到大吉岭，不久，就到菩提亚学校任藏文教师，期间接受了间谍训练。乌金嘉措于1878年被派往扎什伦布和拉萨，他借机为达斯提出访问西藏的申请，获得了班禅“拉让”中最有权势的扎萨克喇嘛的批准，并发给他能安全到达日喀则的通行证。

1879年，达斯在乌金嘉措陪同下进藏，在日喀则住了6个月。在此期间，他探索了周边地区，“仔细地记录了他观察到的方位和距离”，“并在回印度时带走大批珍贵的梵文和藏文书籍”^②。达斯取得了同意他进藏的扎萨克喇嘛的好感，这为他第二次入藏打下了基础。1881年11月，达斯与乌金嘉措第二次赴藏。“乌金嘉措做他的秘书，从事收集资料和土地测量等工作，但……极为重要的测量，大部分还是钱德拉自己做的。……特别是需要谨慎小心。”^③这次达斯费尽心机绕道潜入拉萨，并在帕拉夫人的帮助下会见了只有8岁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他还探测了桑耶、泽当、萨迦等地，“他在所到之处都以他一贯的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收集当地有价值的信息”^④。达斯第二次在藏逗留了近14个月后才返回印度。本书就是他对此次西藏之旅的记述。

达斯第二次西藏之旅的笔记，“印度政府作为绝密材料保存”^⑤，他所窃取的情报无疑为英印当局提供了重要资料。该笔记于1902年由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在伦敦正式出版，名为《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美国驻华外交官、藏学家罗克希尔被地理学会选中作为此书的编辑，他写了“导论”，并为此书做了大量注释。本书据英国伦敦1904年新版，由熟谙藏学的资深翻译家陈观胜和李培荣翻译成中文。此书是首次译为中文本行世，译文精准、流畅，是一本颇具资料价值的西藏近代史研究参考书籍，它能使我们了解

① 周伟洲《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第81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

② 见本书“罗克希尔导论”。罗克希尔，一汉名为柔克义。

③ 见本书“罗克希尔导论”。

④ 见本书“罗克希尔导论”。

⑤ 见本书“罗克希尔导论”。

到 19 世纪末期帝国主义觊觎下的西藏,尤其是后藏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等多方面的状况。

1. 西藏各阶层人士对西方殖民主义者 侵略行径的坚决反抗

西藏地方政府与西藏人民对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探险家”之流进入西藏一直是坚决抵制的,总结出:“凡是英人通商游历所在,将来即为英国之地。”^①清中央政府允准外国人进藏传教、游历的一纸告示,更是引起了西藏僧俗上下的激烈反对,公同稟称:“……僧俗大众闻之,不胜震惊。唯有恳请据情转奏大皇帝……即飭令英国、法国、美国并天主教,不必来藏游历传教,亦不必由藏经过。如伊等心中不愿,仍要前来,小的人等,只得会合同教部落,帮同竭力阻止,非势穷力尽,不致弃佛教之宗源,失众生之素志。”^②西藏各阶层人士及僧俗百姓对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的反抗是异常坚决的,从西藏档案馆所藏当时的藏文呈稟中可以看到“自咸丰以来,西藏僧俗人等订有盟誓,‘一致议定,绝不让一个洋人入藏’。”达斯也在书中写道:“德拉顿珠(民兵队长)接到康巴宗发来的命令……他必须全副武装,立即带上队伍以及火绳枪、长矛、刀剑、投石器等武器出发到拉成边境去。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欧洲军官正在朝西藏边境走来,这个情报是边境卫士传来的,所以急需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这种几乎全民抵御外国人的情况下,达斯他们的间谍行动自然是极为谨慎的。“乌金用他的念珠测量出墙的长度为 4500 步。他每走一步就拨动一粒珠子,同时念一句六字真言‘喻、嘛、呢、叭、咪、吽,和他一起转经的善良的江孜居民不可能知道他这样做的真实目的。”^③达斯和乌金嘉措伪装成宗教信徒和医生博取藏族的好感,达斯用他自己掌握的一点医学知识给缺医少药的

① 《清季筹藏奏牍》文硕卷。

② 《咸丰十一年驻藏大臣满庆等奏藏人不愿洋人入藏游历传教折》,转引自《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第 147 页,三联书店,1963 年。

③ 见本书“罗克希尔导论”。

西藏上层看病。书中多次讲到他用一种神秘的发泡药,“我告诉他们这两种药混在一起会沸腾起来……果然起气泡了,还发出嘶嘶的声音,病人吓得倒退一步……那些旁观者惊奇的张口结舌,对我这个了不起的阿木奇怀着无限敬佩之情”^①。其实这只是异常便宜的苏打粉,可以助消化,治不了大病也不会有任何副作用。

达斯两次入藏正值拉萨的西藏上层反英情绪趋向高潮的时候,由于处于后藏的扎什伦布寺接待了达斯并给予他各种便利,而在前后藏的宗教上层之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风波。

《藏族简史》一书对此也曾有过描述:“英印政府利用锡金一名贵族喇嘛同扎什伦布寺的宗教联系,派他陪同达斯……两次偷越边境,进入西藏。达斯兼通梵文、藏文,并略知医术,他先到后藏,结识了班禅系统一名极有地位的活佛和拉萨的帕拉贵族。通过他们的帮助,他从日喀则到了拉萨,对西自萨迦,东至桑耶,南至雅隆等地,做了勘测调查。此外他还盗走了二百多帙珍贵的藏文古籍和手稿,包括不少在印度已散失数百年之久的梵文著作。……拉萨当局终于察觉了达斯的真正身份,认为这是扎什伦布寺与英国私通关节、盗窃机密的行为,为此这个接待过达斯的活佛,被处以宗教上的极刑而丧失生命,帕拉家人受到流放和抄家的处分,其他有牵连的人士也都受到不同的严厉惩罚。”

这个被西藏地方政府处以极刑的活佛即书中被达斯称为“总理大臣”的仲孜寺第四世生钦呼图克图。他因接待达斯而遭受了最严厉的处罚:被噶厦没收财产,撤销职务,禁止转世;将其押解到拉萨,囚禁木笼中游街,并多次当众鞭挞,以儆效尤。1887年6月,按噶厦政府命令,生钦活佛于流放地工布江达被反缚双手,溺毙河中。西藏地方当局对后藏一位转世高僧如此严厉的惩处,既可说明当时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从保护佛教、维护自身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而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决心,也“可以说这是达赖、班禅这两大黄教系统之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开的裂痕,亦是长时期来,英印侵略势力蓄意制造西藏内部矛盾的一个结果”^②。

1890年,被称为生钦的转世灵童降生于土尔扈特王府,但直到

① 见本书“罗克希尔导论”。

② 《藏族简史》,第29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

1905 年达赖到达当时的外蒙古时,转世才获承认,并恢复其名号为第五世生钦呼图克图。关于历世生钦及仲孜寺的详情请看书末房建昌专文阐述。

2. 多方位展现 19 世纪末期后藏社会状况

19 世纪以来,以各种名目进入西藏的传教士、探险家逐渐增多,他们中的多数人承担了殖民主义者侵藏先遣队的角色,但这些潜入西藏的西方人士又大多具有某些专门知识和技能,他们或“探幽极远,绘画地图”,或“查看道路形势,探明风土人情”^①。在随后公开或不公开出版的游记、笔记中,多方位地展现了西藏社会生活,保留了很多原始素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当时的西藏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达斯此书即为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

《拉萨及西藏中部之旅》一书是日记体裁,逐日记载颇为详细,衣食起居、社会交往等描述自然也较为具体,又因达斯之旅主要停留在后藏,使我们获得了许多在其他同类书上所没有的后藏贵族和僧侣上层的生活状况、宗教活动及民间社会风情。

如有关驻藏大臣在后藏活动的记述较其他书充分:驻藏大臣的出行仪仗、规模、程式;驻藏大臣去日喀则解决钱币不分成色流通一事;处理驻藏帮办大臣去定日巡查阅兵时,因沿途差费供应与当地官员和百姓的纠纷;日喀则阅兵场;江孜驻军各级待遇等,驻藏大臣显赫的权威和官员的骄奢跋扈等都跃然纸上。

书中有一段关于教派斗争的记载也为其他书所鲜见:“2 月 19 日……达赖政府对于扎什喇嘛(班禅)在红帽派喇嘛那里受戒表示抗议,萨迦班钦是红帽派高僧。达赖喇嘛谴责扎什喇嘛纵容邪教……为此,达赖政府不邀请扎什喇嘛去为西藏的最高统治者授戒,因为达赖既然是格鲁派的,他就不能和以萨迦班钦为首的教派有联系。”由此可以看出格鲁派不仅排斥其他教派,而且公开视其他教派为邪教;除此以外,当时达赖政府和班禅集团的矛盾

① 吴丰培辑《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489~492 页,中国藏学出版社。

也已初见端倪。

达斯在藏期间,适逢八世班禅圆寂和新年、宗喀巴生日、喇嘛转世、班禅主持开光典礼、时轮坛城崇拜开幕仪式、莲花生诞辰等各种盛典,书中对这些活动的内容、形式、礼仪、人物、服饰等诸方面都有记载。达斯还曾深入到羊卓雍湖、拉萨、山南等地,有关帕拉夫人帮其打通关节参与集体拜见达赖喇嘛,及多吉帕姆为生病的达斯作法事等情节也很生动有趣。从对第一世策墨林喇嘛进行社会改革之事的记述,了解到原来西藏妇女头上戴头饰、腰里系围裙等习俗是自策墨林始。书中还记载了西藏贵族与锡金王室联姻,克什米尔三年一贡的华丽队伍,康区喇嘛 700 匹骡子的商队,及多处对市场、货物的描写……反映出当时后藏的商业贸易、对外交往等方面有着并不逊于拉萨的繁荣。

达斯在西藏停留了一年有余,书中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在他那尽可能周全地为英印当局提供的笔记中,也有着对前后藏人民生活 在农奴制社会下贫穷落后状况的白描。如:他在大多是艰难的旅途中走过“破烂的、用石头砌成的小屋”,发现“许多路段极为泥泞,马匹踩下去,稀泥淹没了马的膝盖……”慨叹“西藏没有有车轮的交通工具”,即使是小昭寺,门前的道路也是“泥泞、恶臭”,给他做饭的厨师“既不洗脸又不刷牙,身上总是很臭”。还有那无处不在的乞丐:“在扎什伦布寺东门……挤满了男女乞丐……看见几队囚犯,身上戴着 20 多磅重的枷锁。有的上铁手铐,有的上木手铐,不少囚犯被挖了眼珠,政府不为他们提供食物,让他们在市场上讨饭……大约有 1000 名乞丐站立在从扎什伦布到日喀则的路上。”

达斯还写到当时西藏的法律、赋税、差役等诸多方面的情况,承认穷人“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西方人笔下西藏的真实,与他们惯常挂在嘴边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等有着巨大的反差。当然由于作者的特殊身份,论述所及大都从他所持的立场观点出发,书中一些诬蔑不实之词,道听途说之语,相信读者也自有明鉴。

23 年前,陈家珽先生组织翻译了国内第一套《西藏研究参考丛书》,将西方近一二百年出版的有关西藏的外文书籍择其重要者译成中文提供给刚起步的藏学界使用,对极度匮乏资料的学界同仁不啻为雪中送炭。陈家珽先生可谓是改革开放以后为新兴的国内

藏学研究事业铺路垫石者之一,日前陈先生不幸辞世,赘此数语,
是为纪念。

季垣垣

2004年3月24日

导 论

萨拉特·钱德拉·达斯于1849年出生在东孟加拉吉大港的一个属于医生种姓的印度教家庭里。他在加尔各答管理学院上学时,有幸认识了时任孟加拉公共教育局局长的艾尔弗雷德·克罗夫特爵士,他们从此成为朋友。该局长指导他学习地理和文学,并把他推荐给印度政府,钱德拉因此才有可能几次赴西藏进行重要的旅行。

萨拉特·钱德拉还在该学院工程系学习时,于1874年被任命为菩提亚住宿学校校长。该校是孟加拉副总督乔治·坎贝尔爵士下令在大吉岭开办的。萨拉特·钱德拉即刻奋力学习藏语。他与锡金的国王和许多大喇嘛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在此后的几年中多次到锡金进行短暂的旅行。

乌金嘉措喇嘛是钱德拉所管学校的藏文教师,1878年在其寺庙的赞助下被派遣到扎什伦布和拉萨。乌金嘉措乘此机会探听西藏当局是否允许钱德拉访问西藏。这位喇嘛很幸运,他获得了扎什伦布寺班禅活佛的总理大臣对钱德拉访问那个伟大的喇嘛学习中心的邀请。关于那个中心,乔治·波格尔和塞缪尔·特纳曾为我们留下了很有趣的描述。为了确保钱德拉在西藏的安全,使他以合法的身份出现在以怀疑的眼光望着他的喇嘛和中国人面前,该总理大臣把这位印度绅士的名字列入当地这座大寺庙的神学学习者的名单中。乌金嘉措还带来了该总理大臣发给钱德拉的通行证,使他能自己选择进西藏的道路,并确保他安全到达日喀则。

萨拉特·钱德拉带着这些证件于1879年在乌金嘉措喇嘛的陪同下前往扎什伦布寺,他在那里住了将近六个月。作为该总理大臣的客人,并得到总理大臣的支持,他可以在这个寺庙的大图书馆中仔细查阅丰富的藏书,并在回印度时带走大批珍贵的梵文和藏文书籍。在这次旅行中,他还探索了干城章嘉峰北部和东北部地区,仔细地记录了他观察到的方位和距离,这个地方在他之前是不为外人所知的。此次旅行还有一个同样宝贵的收获,那就是这个旅行者和那个开明的、有权势的总理大臣结下了友谊。此大臣

从萨拉特·钱德拉口中知道了不少关于西方文明的事和奇妙的发明,并对此很感兴趣。他邀请钱德拉再次到扎什伦布寺去,以便继续给他讲西方的奇妙的事。

钱德拉回到印度之后,他的第一次西藏游记由孟加拉政府出版,他的朋友艾尔弗雷德·克罗夫特爵士为他的游记作序。第一次旅行描绘的路线和他第二次于1881~1882年赴西藏的更广泛的旅行的路线相同,而且正如这本游记所示,他于1879年在西藏的研究成果几乎全是关于历史和宗教的题目,因此可以不把它们放进目前的这本书中,只把在后来更全面的报告中没有的关于西藏地理和民族学的材料放入脚注。

萨拉特·钱德拉在他的大吉岭家中度过了1880年,这时他根据这次旅行中收集的材料撰写了若干篇关于西藏历史、宗教、民族、民俗的论文。这些论文大多对东方学学者有很大的价值,它们发表在《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和《印度佛经学会会刊》上。印度佛经学会是钱德拉于1892年创立的,他一直是该学会的秘书。

1881年11月,为了履行他对班禅活佛的总理大臣的承诺,萨拉特·钱德拉第二次赴西藏,陪同者仍是乌金嘉措。乌金嘉措做他的秘书,从事收集资料和土地测量等工作,但土地测量,包括对白地湖(羊卓雍错)的极为重要的测量,大部分还是钱德拉自己做的。这次赴藏,萨拉特·钱德拉仍把总部设在扎什伦布。他从那里出发沿雅鲁藏布江两岸旅行,从西部的萨迦到东部的桑耶和泽当。他很幸运,能到拉萨去作一次短暂的旅行。在他之前只有两个印度人去过,一个是奈恩·辛格于1866年,另一个是基申·辛格于1880年,后者绘制了一幅很详细的拉萨全市及其近郊的地图。钱德拉在拉萨受到达赖喇嘛的接见,并参观了一些重要的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需要谨慎小心,他不能到拉萨市及其附近的许多很重要的地方去参观。不过他的宝贵的笔记仍然是对他之前的旅行者留下来的笔记的极为重要的补充。

在西藏的首府作了短暂访问后,萨拉特·钱德拉又去探测据说西藏文明发源地的雅隆河谷,他在所到之处都以他一贯的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收集当地有价值的信息。1883年1月,在离开大约14个月后,他又返回印度。

他第二次的西藏旅行记是分两本书由孟加拉政府出版的,名为《拉萨旅行记》和《白地湖(羊卓雍错)、洛卡、雅隆、萨迦旅行记》。由于某些原因,这两本书印度政府作为绝密材料保存,直到大约1890年,其中关于西藏民族学的一部分材料才发表在《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7月号上,5年后又有一部分发表在《19世纪》(Nineteenth Century)7月号上。现在出版的这本书就是将这两本游记合在一起,为使前后语气连贯,作了极小的必要的改动。

1885年,印度政府考虑派一个使团到西藏去,于是派已故的可尊敬的科尔曼·麦考利到北京去,想取得中国对印度的这个计划中的使团的认可。萨拉特·钱德拉陪同科尔曼到中国首都去,在那里住了几个月。正是在他访问北京的期间,我认识了这位印度绅士,他使我终身对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北京期间,萨拉特·钱德拉住在安定门外一个名叫西黄寺的喇嘛庙内。当时所有来北京的西藏商人都住在那里。他身穿中国喇嘛的服装,自称“卡切喇嘛”,即“克什米尔喇嘛”。他的藏语知识、他的广泛的旅游经历,以及他的彬彬有礼的举止,使他获得了许多喇嘛的友谊,其中包括中国喇嘛教的大主教章嘉呼图克图。如果印度的这个使团能到中国,萨拉特·钱德拉当然会随团去,并会为它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可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从那以后,这位印度绅士在大吉岭期间以全部精力从事藏文书籍的出版工作和编撰有关佛教的著作。他在大吉岭担任孟加拉政府的藏语翻译。

印度政府对他为麦考利先生的服务给予了高度评价,在他返回孟加拉后赠与他“莱伊巴哈杜尔”的尊称,并封他为“印度帝国勋位之友”。1887年,皇家地理学会为他在地理研究上的贡献颁发给他“回报奖金”。

萨拉特·钱德拉于1883年从西藏返回印度后写了大量的著作,其学术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他两次赴西藏旅行并从西藏的大藏经楼带回两百多卷书籍,其中有手抄本和木刻本,还有一些是几百年前从印度失传了的梵文经典。根据这些书籍提供的资料,他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论文并加以发表,仅将它们的题目列出来就要用好几张纸。他除了将大量的藏文典籍翻译成英文之外,还用梵文为《印度书目》编辑了克希曼德拉(Kshemendra)的诗,题为

《Avandana Kalpalata》,那首诗是他十分幸运地在拉萨发现的。在藏文方面他编辑了一本很有价值的历史书,另有一本书谈的是西藏在有佛教和苯教以前的历史,他还编了一本很宝贵的藏文语法书,以及其他许多作品,数目众多,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他目前正在编一本藏英字典,即将出版发行,他告诉我,那本字典有 2000 页,并附有梵英对照的佛教词汇表。

以上关于萨拉特·钱德拉的著作的简介足以说明,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他在地理学方面所做的贡献一样重要。我个人永远感谢他在北京期间为我提供的宝贵信息,这些对我后来在西藏的探险有很大帮助。我认为自己特别幸运,被皇家地理学会选中来编辑他的西藏旅游报告,因为我可以借此来公开表示我对他的感激之情,并且我相信,我可以借此来帮助他作为与乔玛(Csoma de Koros)并驾齐驱的最伟大的赴西藏探险的先驱者,取得应当得到的地位。

如果不叙述这位印度绅士两次西藏旅游中的忠实的同伴和助手乌金嘉措喇嘛,那么这篇导论将会是不完整的。这位喇嘛是锡金的藏人,他与锡金王的家族有关系。他 1851 年出生在阳冈,10 岁时进白马央孜喇嘛庙,在庙中学习了 12 年。1873 年,他作为锡金王的随从首次访问大吉岭。就在当年稍后,应副长官埃德加先生的请求,锡金王命他到即将开办的大吉岭菩提亚学校当藏语教师。他起初在那个副长官的办公室工作,后来伴随该官员访问锡金。他从 1874 年开始在该校任教直到 1878 年赴西藏为止。如上所述,他去西藏是为他所在寺庙送贡品给西藏佛教首领的。当他住在大吉岭期间,他学会使用勘察者一般要使用的仪器。后来他在几次旅行中所做的工作极为精确,证明他学得很透彻,很有才干。他于 1878 年赴西藏,返回时为钱德拉·达斯带来通行证,使后者得以两次赴藏,两次都是他陪同去的,他为钱德拉·达斯提供了宝贵的服务。

钱德拉·达斯于 1882 年发现了白地湖^①准确的面积和形状,

① 萨拉特·钱德拉将此湖命名为“羊卓克罗夫特湖”(Yamdo Croft),以示对艾尔弗雷德·克罗夫特的敬意。参见《佛经学会会刊》(Journ. Buddha. Text Soc.),第 4 卷,第 3 部,第 4 页。

艾尔弗雷德·克罗夫特爵士认为此事十分重要,于是在1883年6月派遣乌金喇嘛去勘探白地湖,目的是核实并完成那位印度绅士的勘查工作。乌金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在钱德拉的工作上只加了该湖东南的一小块地方,但却使以前的勘测大为精确。他还探查了洛扎(玛纳谷),并再次访问拉萨,途经唐拉山口和春丕谷返回印度,于当年12月抵达大吉岭。有关他那次工作的报告是霍尔迪奇·托马斯上校(即现在的托马斯爵士)写的,发表在《1856年至1886年在锡金、不丹、西藏的探险报告》中。此报告于1889年由“印度三角学测量会”出版,本书的注释曾多次加以引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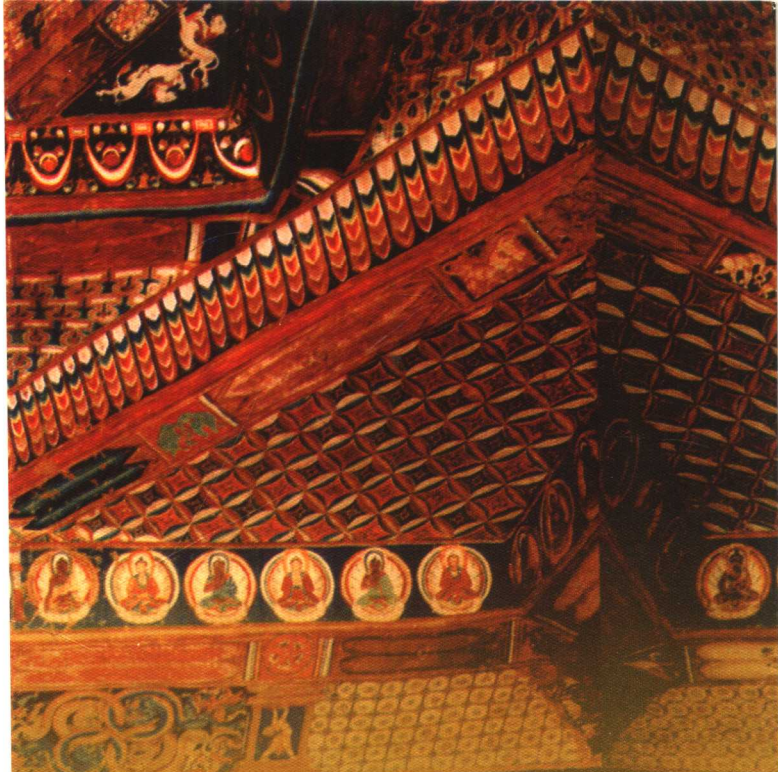
后来乌金喇嘛因服务有功受到印度政府的奖励,政府赠与他“莱伊巴哈杜尔”的尊称,一枚银奖章,还有一笔钱。他被聘为印度政府的首席藏语翻译员,并以此身份为前不久进行的锡金探险工作服务。他还为萨拉特·钱德拉编辑藏文书籍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W. W. 罗克希尔

于美国布洛克岛

1899年7月27日^①

^① 此书的出版被推迟了。



西藏文明之旅书系

- ◎ 西藏的文明
- ◎ 发现西藏
- ◎ 喇嘛王国的覆灭
- ◎ 西藏宗教之旅
- ◎ 西藏佛教密宗
- ◎ 西藏史诗和说唱艺人
- ◎ 喜马拉雅的人与神
- ◎ 鞑靼西藏旅行记
- ◎ 拉萨及西藏中部旅行记
- ◎ 圣城拉萨



丛书策划：文群

责任编辑：永红

封面设计：印象·迪赛
13910595075



目 录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从大吉岭到扎什伦布 1

第二章

住在扎什伦布 37

第三章

仲孜之旅 57

第四章

为赴拉萨旅行做准备 85

第五章

从扎什伦布去羊卓桑顶寺,前往拉萨 99

第六章

在拉萨居住 119

第七章

拉萨政体——风俗、节日等 137

第八章

返回扎什伦布,乌金嘉措访问日加申达苯教神殿 155

第九章

班禅仁波切的丧礼,访问桑耶寺和雅隆 169

第十章

参观萨迦,返回印度 187

第十一章

社会各阶层、婚俗、丧葬、医药、节日 193

附 文

达斯、罗克希尔与生钦活佛和仲孜寺 209